



嘉宾：Jeremie Descamps，城市规划师和汉学家，城市咨询与研究机构Sinapolis创始人。自2017年9月开始，于法国巴黎-瓦尔德塞纳国立高等建筑学院授课，参与中法“都市创新机动性”讲坛

采访：刘丽丹，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地理学院博士学校8686研究室博士研究生，lidanliu1986@gmail.com

（注：本文系法文采访，后由采访人翻译成中文）

# 中国城市研究的在地实践与思考

## ——中国城市研究专家Jeremie Descamps访谈

Jeremie Descamps=JD 刘丽丹=LLD

### INTRODUCTION

#### 引言

Jeremie Descamps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开始从事中国城市的研究与实践工作，至今已有17年。本次采访以其在中国实地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为基础，就在地的研究与实践带给他的思考、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中法两国城市发展的可比性以及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建议等主题展开访谈。

## 01 研究中国城市的缘起

LLD：从2000年开始，您以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开始在中国的在地城市研究与实践，可否请您简单谈一下当时是什么城市现象或者哪些城市问题吸引了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JD：在结束了法国国家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中文学习以及同期在巴黎规划学院的城市规划专业学习之后，于2004~2005年开始了我的职业道路。先是在巴黎的马拉盖建筑学院工作，主要帮助学院与清华大学开启一份合作合约——这算是建筑教育领域内第一批中法合作合约之一。之后我加入了当代中国建筑观察站，它间接地附属于法国文化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都是在不同的尺度及等级下开展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我们的工作更多与以下主题相关：遗产保护、当代建筑、理解中方对话者的需求，特别是理解他们是如何运作的等等，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和法国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专业与制度方面的合作关系。2007年我在北京开设个人咨询与研究办公室Sinapolis的同期，仍然与这个中法合作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继续开展和当代中国建筑观察站、法国的建筑学院以及中国的相关机构，主要是建筑事务所、设计院和大学的广泛合作。之后这个合作网络也对许多其他的机构和主体开放，如艺术家、社会学家、导演、地理学家、非政府组织、文化中心以及基金出资方等。

当时对于我一个年轻的毕业生而言，评估城市问题和城市现象是比较难的，而且整个中国在那个时期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我和同事们在那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实地考察各种方案设计——参观了上百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老城区的消失，城市、街区及街道尺度的扩大，当然同时也诞生了有利于遗产保护的具体立法方式，城市中

也涌现出不可回避的新的参与主体角色，比如大学、独立事务所等。他们选择了不同于我们的方式来接近已城市化的或者待城市化的土地。面对问题，他们提供了一种更符合当地背景而非完全标准化的解决方式。

## 02 中国城市的实地研究与实践

LLD：您在中国生活了15年，可以请您通过具体的案例来介绍您在中国的城市实践或者研究吗？

LLD：您曾经在一篇文章<sup>1</sup>里提过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在中国，我想不应该只是从建筑的侧面来看问题，西方的专家已经倾向于不仅关注房屋个体，而且我们学着去观察发展轨迹，这就是我们说的土地、地理学、街道与城市格局、街区的社会特性。而这些对于理解中国城市的质量与性格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尤为重要的是空间的组织结构……”您可以详细说一说这其中提到的“空间的组织结构”吗？对它如何定义以及您在此基础上有什么新的发现？

JD：Sinapolis工作室尝试开启并发展了一个城市的双重研究维度。一方面，我们提供一个城市技术的或者城市科学的维度。这指的是在方案设计、调研、研讨会以及工作营的框架下，为国际组织机构（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部门、大使馆、公司等）在中国的在地项目提供咨询。我在北京、柳州、曲阜及浙江的仙居也进行过一些更具实操性的研究和调查，如城市前期诊断分析、城市与建筑遗产的修复研究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行动。另外，我也从事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横跨研究，比如一个持续3年的艺术-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主题是“当代中国的机动性的记忆和想象”，此研究得到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研究与交流所的资助。另一方面，Sinapolis也有一个关于城市文化发散的维度，借助欧洲和中国之间跨文化的项目计划得以实施：展览、出版物、工作坊、电影及网络纪录片、公共沙龙对话等。这个跨文化的维度一直是我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前一个技术维度的补充。

在我看来，实际上空间的制造与我们从这个空间制造之中获取的知识是同等重要的。也正是这个原因，Sinapolis的合作者不仅有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还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政治科学领域的专家，甚至还纳入了语言学家。

我一直致力于科学维度与文化维度相关联的Urbanism研究和实践，在我看来，这个方向也适用于中国。不过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非常快，目前看起来这个过程还是有些过于以技术为中心。因此，引入一种社会文化维度的，包括艺术的，同时在技术鉴定更加专业的分析和视角是非常重要的。

JD：中国的城市化显现出了一个更加剧烈但又仿佛自相矛盾的双重现象，即同时存在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与自下而上的微观需求。一方面，整片国土的城市空间都在被标准化或者被合理化——这体现在城市干线网络的创立，功能主义方式的城市组织，建筑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在地身份又随之加强。这种在地身份的加强指的是：比如通过一种更优化的遗产保护系统，或者通过一种更优化的对现存的尊重和整合，还可以通过计划方案的公民参与，当然更可以通过介入规划和建筑计划的当地政府、建筑师与规划师对计划在地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背景更好的认知与理解。最后对于一份规划成果而言，对政府的高质量要求也是必要的。以上这些要素对于在地身份的新发现和保持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城市空间被标准化的同时，仍然存在着无论面貌还是形态都非常不同的城市。因此，这种从中国国土北部到南部显示出的不同，需要继续保持。当然，将中央国家的理性目标与在地的特性有所结合也是随之而来的挑战，这也使得多样化的参与主体角色是非常必要的。

## 03 研究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LLD：通过您在中国的研究和实践，您有哪些收获和思考？遇到过哪些困难或者限制？

JD：我遇到的首要困难是关于外国身份的事务所或者工作室参与中国城市项目的可能性。比如以我创立的城市咨询工作室而言，如果想真正参与到中国的城市项目计划，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工作室规模太小，也有城市是一个相对政治的主题的原因，作为外国人比较难以获得充分的数据，比如用于研究

或者项目启动的平面图或者统计数据等等。我们工作偶尔会使用只有200k清晰度的JPEG格式的平面图，而且通常需要花费较大的力气才能得到一些已经描绘过的平面，或者只能自己在百度或者谷歌地图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但是还是有一些和我们合作的市级部门或者机构组织给予我们信任，这是基于我们的介入一直是在与建筑师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的，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原有建筑项目合作的基础之上。

另外的问题是关于向外国人开放的市场。这些市场开放的招标项目经常是被规模很大的国际建筑事务所获得，或者他们被直接委托进行城市项目的创建及新的城市形式的构思。但是比如像我的工作室其实也有能力对在地的背景进行充分的分析，只是因为规模比较小而无法得到类似的机会，也就错失了一些为中国城市发展献计献策的可能性。

还有另外一个内在的问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在城市层面缺乏多样化的参与主体，只是局限于技术人员、立法机构、设计师及房地产商。但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看到这种趋势有了变化。因为随着城市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参与主体介入进来，政府部门、甲方、房地产商和运营商带着他们的思考与其他的参与角色——智库、非政府组织、居民、艺术家以及一些小规模公司等一同介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

## 04 对中国城市发展变迁与发展的 印象和评价

LLD：可以请您简单谈一下今日的中国城市发展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吗？您如何评价中国城市的发展变迁？您可以举某个城市作为案例具体谈一下。

JD：从个人经历的尺度来看，确实比较难以在所有的变化之间建立一个连续性。以我自己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刚到中国一直到今天的过程来看，就好像我在不同的国家过着不同的生活一样。中国大都市的变形是那么的显著，时间看起来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无法（为这样的变化）建立一个明晰的直线图形。我想很多中国人也有这种突变的感觉。

从城市和国土的尺度来看，普遍而言，可以通过城市人口生活条件的总体改善（特指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以及通过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交通以及连接网络、公共空间、建筑质量等，来估量那些变化。但是这种持久的城市化节奏会造成诸多的问题，也可以说（目前的问题）是源自这些增长，如自然资源的压力、社会驱逐以及经济债务等。

不过，也有一些积极的协议开发区的例子，我想到更多的是城市-（辖）区，比如位于上海郊区的青浦区和嘉定区，我多次到访那里。这两个城市从城市遗产的融合（和朱家角）、当代建筑方案与自然廊道相连接的景观规划，以及与上海市区的创新连接等都展示了深远影响。孙继伟作为上述城市-区的领导者，他懂得与一个非常好的当地设计师团队一同工作。他的能力主要在于成功地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以及当代建筑的合理要求相互衔接，在新的项目中给予文化一个可选择的一席之地：这种结合在中国还不太多见。

LLD：请问您如何评价北京城市的新版总体规划？如何看待雄安新区的规划？

JD：让我对雄安新区的新方案发表意见对我而言还是有点难的。一方面，它是一个政府团队准备就绪的政治方案。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京津冀框架下的区域经济战略方案，另外也具有成为城市示范项目的强烈雄心，特别在环境方面。最后，这个方案意在创建一个城市来为北京减负。不可否认，如今在北京同时集中了太多的功能，有与中央政府相关的，有与它的首都城市角色相关的，有与市政府工作相关的。不过北京因其极其巨大的吸引力，在现在以及未来都仍然还是商业和文化的交汇中心。

但是，我想不能把北京的新版总体规划与雄安新区的创立放在同一个计划之上，这指的是因其各自不同的领土，以及不同土地上的不同居民，使得这两个方案设计区别很大。北京的新版总体规划应该纳入这张新牌，但尤其应该加强现有的法规条例，而且应该在规划整治中找到“过于放任”和“过于管控”之间的平衡点。

## 05 中国与法国城市发展的异同点

LLD: 您觉得在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以及城市发展模式方面,中国的城市与法国的城市有什么不同?

JD: 中国与法国实际的形势与处境是不具备可比性的——除了首都城市比如巴黎,在那里首先城市的推动仍然非常重要,另外在一个更小规模的体量上(比如污染、交通量等)可以遇到(和中国城市)类似的问题。人类第一次面临如此快速变化的城市现象,这在全世界城市的历史长河中也是首次,(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完全面目一新了。

另外,在中文语境中,Urbanism<sup>2</sup>这个词语是不存在的,表达上多用城市规划,这是需要修正的。因为Urbanism这个词融合了一个城市制造的所有方面,政治的,法规的,同时还有社会及人文科学方面。我在2014年受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托完成的一项调研中,正好提出了从城市规划走向Urbanism的建议。换句话说,特别是现在,要转向街巷和街区现存的和新建创造的细节工作之中。这已经在上海、杭州、宁波及广州得到大范围地实施,但是还需要继续推广。

## 06 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建议

LLD: 您觉得中国的城市发展未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JD: 我想在之前的回答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回应,但显然还有另外一些问题让我有点担心。如果我们看看中国城市的城市化方式,实际上太多的发展部分交由房地产商来操作。这指的是市政府去建设城市尺度的网络、干线,但是以满足房地产商的目的来画那些千篇一律、单调无奇的楼群,这些本应该由规划师负责的(街块内部)工作也交由房地产商负责。我觉得需要改变这种趋势,因为房地产商,特别是那些有企图投机的房地产商,绝对不会致力于创建一个城市、注重城市特性(Urbanity)以及在街区中间的社会关系。政府方面应该肩负起这些责任,因为Urbanism的缺失或早或晚都会使得未来的政府付出更昂贵的代价,特别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比如在法国就会经常发生郊区暴乱。

我的另外一个担忧是对于北京而言。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彻底变化时期,随着京津冀大都市化,市政府功能迁移到通州,冬季奥运会的接待工作等等陆续开展,但是没有任何的对外咨询,也没有真正地向公众传递方案设计。这种城市化的方法让我觉得有些过时。而这个形势因为在北京出现所以显得更加反常。因为北京在别的地方涌现出完美的公众参与式的Urbanism操作,比如国际设计周,比如史家胡同以及其他的经验等。事实上,我们感觉到权力的力量在内部有反对或者有冲突,这也影响了上百万市民的日常生活,这其中既包括北京土著也包含在北京的外地人。

注:此访谈得到了法国远东学院EFEO(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和「四名」汇智计划的支持。「四名」汇智计划是北京市西城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中心与名城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在2017年度开展的名城保护行动支持计划,获得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共同支持。



### 注释

1 《联结》杂志专访Jeremie Descamps,访谈者Anne Garrigue,2010年7月

2 在法国,Urbanism(法文为Urbanisme)与城市规划(法文为Planification urbaine)有很大的区别。Urbanism的含义更广,而城市规划更多指的是技术的和政治层面。

责任编辑:刘晓玲